

横城反击战：穿插迂回作战教科书

■胡思磊 左玉洋 杨绍通

横城反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，于1951年2月11至13日，在朝鲜横城地区对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。这次战役共歼敌1.2万余人，给“联合国军”以沉重打击，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完成战役防御任务起到重要作用。

西顶东反，诱敌深入。横城反击战，是志愿军在连续进行3次战役后未得休整和补充的严重困难条件下，主力紧急转入作战准备，并且是远距离开进进行的一次作战。

1951年初，随着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结束，“联合国军”在中朝军队打击下，弃守汉城，节节后退。与此同时，因人员伤亡和后勤补给困难等原因，志愿军分别集中于高阳、金化、洪川等地休整，补充弹药。

为挽回败局，1月25日，“联合国军”在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的指挥下，分东西两线对志愿军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，意图将志愿军逼回三八线以北。

志愿军总部当机立断，决定采取必要的反击，制定了“西顶东反”的作战方针：决心以部分兵力在西线汉江南岸实施坚守防御，牵制“联合国军”主要进攻集团；在东线诱敌深入，抓住有利时机，集中主力实施反击，从侧翼威胁西线之敌，制止其进攻。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39、第40、第42、第66军（简称邓华集团），在东线向横城、原州方向实施反击，朝鲜人民军第2、第3、第5军团在邓华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。

分析敌情，抓住战机。由于美军火力猛烈，且主力集中于西线，给志愿军第38、第50军造成了很大的防守困难。而这时，东线向横城和砥平里地区北进的“联合国军”，正在以快于西线的速度一路推进，从整个战线上突了出去，形成了两个战线突出部。

表面上看“联合国军”长驱直入，反过来从战略防御角度讲，突出阵地是极为不利的。因为防线若有突出的一部，就等于使这部分士兵陷入三方合围的火力网中，容易被两翼包抄、陷入合围。



横城反击战中，志愿军某部向敌后穿插

战场瞬息万变，战机稍纵即逝。2月5日，彭德怀电令第42军对东线北进的“联合国军”进行阻击，以缓解西线志愿军面对美军强势火力的阻击压力。同时，命令邓华指挥的第39、第40、第66军向东移动，伺机反击。很快，东线的“联合国军”已经在砥平里至横城一线两处突出，为志愿军从两翼反击创造出有利战机。考虑到志愿军现有兵力尚不能同时对砥平里、横城两地展开进攻，先打何处亟须定下决心。

当时的两种考虑各有利弊：如果先对砥平里之敌展开打击，可直接震撼“联合国军”在西线的主攻集团，有利于减轻西线志愿军第38、第50军的压力，同时缩短第39、第40军行军路程，减少部队疲劳。

砥平里配置美军5个营，兵力火力集中，战斗力较强，工事坚固，不利于分割歼敌。如志愿军两昼夜不能解决战斗，其东、南、西三面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均可实施增援，志愿军将面临极为被动的局面。

另一边的横城，集结兵力虽多，但顶在最前面的是南朝鲜军队，不仅战斗力弱，而且处于运动状态，态势突出，两

翼暴露，有利于志愿军主力在人民军配合下将其围歼，初战便打乱敌阵势的把握较大。

经慎重考虑，彭德怀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，若攻击得手，再向原州、平昌及该线以南扩张战果；即使战况不利，也可控制洪川地区，有利于后续作战。部队由11日黄昏至迟12日黄昏开始攻击，由邓华依据情况具体部署实施。

2月9日14时，邓华决定集中第40、第66军全部、第42军主力及第39军1个师，共9个师歼灭横城以北地区南朝鲜军第8师和美军1个团，要求各部于10日前集结完毕，11日17时发起攻击。

分割围歼，出奇制胜。1951年2月11日17时，邓华集团按计划从西起居瑟峙、东至三巨里约33公里的地段上，经过火力急袭后突然发起攻势，拉开横城反击作战序幕。

朝鲜多为山地丛林，一旦包围不严密很容易导致敌人逃脱。因此在这次反击战中，志愿军部队采取了战役上多层次迂回包围和战术上分割包围的战法。在部署上，先以第42军125师和第66军196师构成外层迂回包围，以第42

军124师和第40军构成内层包围，最后由第39军117师进行战役分割。

迂回包围的成败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选择较为理想的开进路线，保证按时穿插到指定位置。第42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速攻占上物安里、石子洞，歼敌1个搜索连并击溃敌1个营，为第117师和第125师打通了前进道路。至2月12日晨，第42军进占广田，与第40军118师一部会合，先后又歼敌800余人（包括敌炮兵150余人，缴获榴弹炮6门），击溃敌军4个连，直接截断了南朝鲜军第8师部队与横城的联系。

第39军117师轻装上阵，大胆穿插一夜急行30公里，于2月12日6时30分提前到达鹤谷里、夏日地区。此举直接切断了南朝鲜军第8师南逃退路和横城之敌北援的道路，并顺势歼灭自石子洞南逃之敌1000余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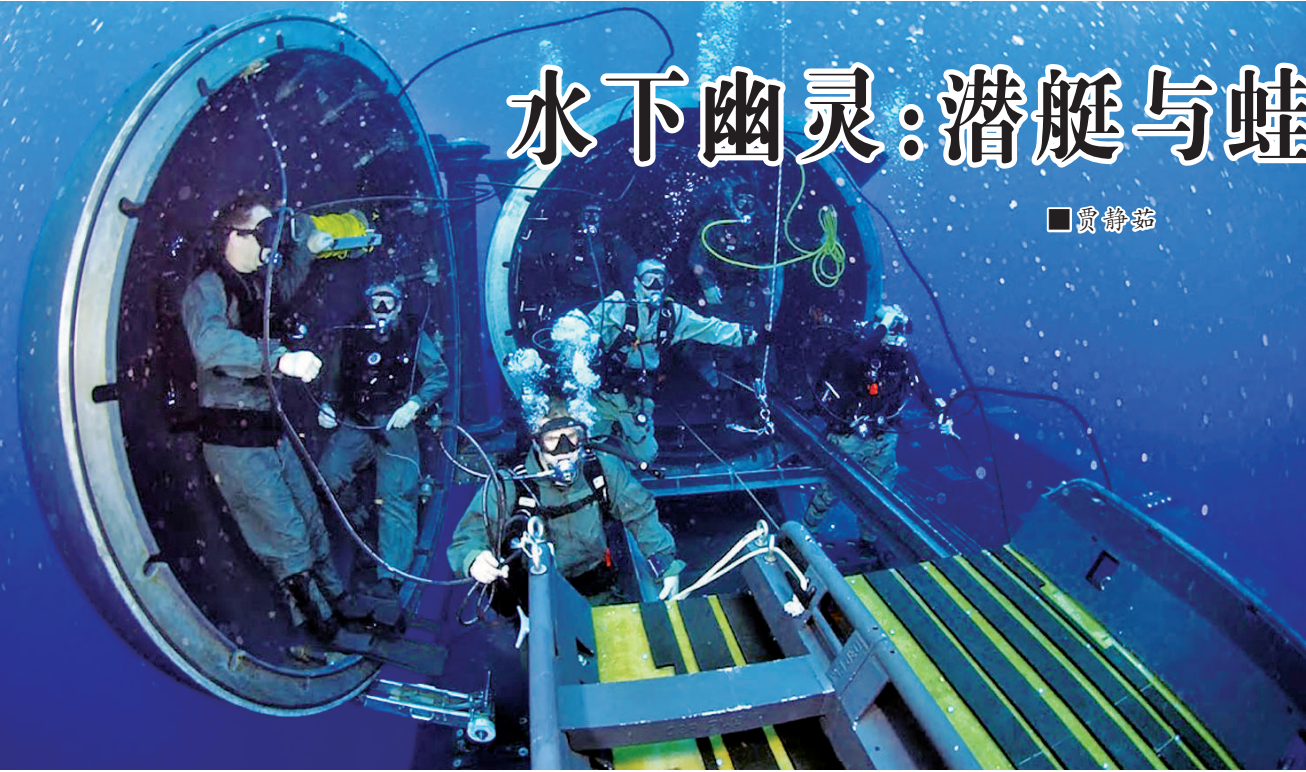
各师在完成战役上分割包围的基础上，进而进行战术上的分割围歼，将被围之敌分割成若干小块逐步歼灭，并注意捣毁敌军炮兵阵地，使其步兵失去火力支援。

至2月13日清晨，横城反击战结束。志愿军全歼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、美军第2师1个营、美军和南朝鲜军4个炮兵营，另歼南朝鲜军第3、第5师各一部，共歼敌1.2万余人，缴获各种炮139门、火箭筒122具、各种枪6200余支、坦克7辆、汽车550辆，迫使敌军在东线后撤26公里，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反扑锋芒。横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歼灭美军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。

李奇微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横城作战：“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，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，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……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，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。”



史说新语



■贾静筠

1941年12月，意大利海军“斯凯尔”号潜艇，秘密潜行至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驻扎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外围，投放3枚由蛙人驾驶的“猪”式人操鱼雷。蛙人操纵鱼雷尾随军舰穿过港口密布的反潜网，炸沉英国海军“勇士”号和“伊丽莎白王”号战列舰，炸伤“萨古纳”号油轮和“杰维斯湾”号武装商船。

潜艇投送蛙人至作战区域，遂行侦察、监视、破袭、反恐等任务，这一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样式，成为日后各国特种部队使用蛙人的实战样本。

潜艇和特种部队的蛙人均被冠以“水下幽灵”的称号，二者相结合更是具备隐蔽性强、机动距离远的先天优势，但同时也面临两大难题。一是对蛙人能力素质要求高。海岸周边海底的结构复杂，影响蛙人导航和辨识能力，还威胁其生命安全。人在水中体温流失和体力消耗远高于在陆地上，加上自身携氧量和作战装备有限，蛙人的潜行距离和时长被进一步限制。要想成功遂行任务，蛙人还必须熟练掌握爆破、侦察等技能。二是对潜艇作战性能要求高。距岸几海里之外的水深通常不足以支撑大型潜艇潜航，而微型潜艇受制于航程和自持力，无法执行远洋、长期

任务，选择渗透点和规划航线时需要强大的情报侦察能力支撑。

随着科技发展，上述两大难题已不再是制约该战术发展的瓶颈。一是蛙人单兵综合作战能力大幅提升。首先是水下供气装置的改进，目前各国特种部队使用较多的封闭式循环供气装置，隐蔽性强、气体利用率高。其次是武器装备，现今蛙人用于自卫和作战的枪械弹药已经发展到水陆两栖，通信协同有水下指挥控制系统，还配有水下爆破、手持声呐、导航仪等装备。潜水理论的完善、科学有效的训练和先进装备的研发，使蛙人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和二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。二是蛙人输送艇的出现，弥补了潜艇在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短板。受制于海底的结构、水深等环境条件和潜艇排水量等，蛙人往往在距海岸线数海里处就被投放出去，增加了潜行距离和时长，增大了投放和回收难度。传统的蛙人投放方式是利用潜艇的鱼雷发射管，蛙人先从潜艇内部舱门进入鱼雷发射管，而后关闭舱门注水加压，使得管中压强和艇外水压平衡，之后再打开外舱门，爬出潜艇，回收时采取相反方式，或者利用潜艇逃生舱对蛙人进行投放和回收。蛙人在这两种投

放方式下，只能携带少量作战装备，无法携带大尺寸和大重量装备器材，只适合小分队遂行作战任务。为改变这种局面，蛙人输送艇应运而生。

最初面世的小型蛙人推进器类似二战时期的人操鱼雷，体积小、重量轻，方便进出潜艇，载员1至2人，以蓄电池为动力，航速只有3至6节，携行能力有限。即便如此，它的出现也大大提升了蛙人的潜行距离和时长，保存了蛙人的体力。为弥补推进器航程不足的劣势，各国又开发出蛙人输送艇。输送艇的体积远大于推进器，有容纳4至10人的载人数，航速6节以上，航程超过10海里，同时配有导航、通信、声呐等系统，部分国家甚至配有鱼雷，可直接打击目标。蛙人在舱室中更便于保存体力，潜行时间一般在4小时左右。

蛙人输送艇的出现大大增强了该战术的灵活性，与核潜艇搭配，可使十几人的特战分队在水下巡戈待命两三个月之久。以当前较为先进的美军 Mk-8 Mod1 型蛙人输送艇为例，机动阶段固定在俄亥俄级核潜艇背部甲板上的换乘舱内。该舱采用核潜艇耐压钢材制作，配置有加压、注排水和照明系统。作战时，蛙人从潜艇水密门进入换乘舱，完成出



明清兵学

《乾坤大略》也称《兵鉴》，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学著作，共10卷，另有《补遗》1卷。作者王余佑（公元1615年—公元1684年），字申之，自号五公山人，直隶新城（今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镇）人。作者在《跋》中明确《乾坤大略》的写作主旨主要是谈兵略：“此非谈兵也，谈略也。”

抱定这一目标，有关战争的其他内容，如选将、练兵、安营、布阵、器械、旗鼓、间谍、向导、地利、赏罚、号令等，均不在论列。王余佑专论“王霸大略”，纵览天下大势，探究帝王成败，试图为一朝一代“扭转乾坤”。

进兵方略

关于进兵方略，《乾坤大略》主要探讨了进兵方向和进兵路线。王余佑将进兵方向作为首要问题提出，列为第一卷的主题，视其为“王霸大略”之首。他指出，为将者必须要“先知所向”，选准并明确进兵方向。

在王余佑看来，兵家所贵者有二，即“贵进取”和“贵疾速”。“贵速”的主张，实则源自孙子。孙子曾言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”，又说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，主张速战速决。王余佑高度认同这一观点，他说：

“兵之未起，其说甚长，不必详也。已起矣，贵进取，贵疾速。进取则势张，疾速则机得，呼吸间耳，成败判焉！”

王余佑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，他进一步强调找准进兵方向，即“不可不知所向”，否则，进兵速度越快，距离正确目标越远。对于正确的进兵方向，王余佑指出，敌方虚弱之处就是我方的进攻方向：“而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。”敌方虚弱，则可直冲其腹地，取敌要害；如果在进兵方向上遇到强敌，那就应“翦其旁支”，攻击其羽翼，设法削弱敌军，寻找继续进兵的机会。

在明确进兵方向后，就需要选择进兵道路。进兵之道，并非固定于一途，而是既有正道，也有奇道。正道不必多言，向来是兵家容易看到并最先选择的，但这不一定是最佳进兵之道。关于进兵路线，王余佑更强调“奇道”，他认为将师进兵必识“奇道”：

“然不得奇道以佐之，则不能取胜。”不懂得“奇道”之将，只能是“愚主”或“黠将”。

决战方略

找准进兵方向和进兵路线之后，就会与敌交战，进而迎来与敌决战的时机。对于决战方略，《乾坤大略》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。

在王余佑看来，初起之兵一定要慎重接战。如遭遇敌军，对战已难以避免，就一定要当作决战来打，即“初起之兵遇敌，以决战为上”。与敌决战的具体方法，《乾坤大略》总结有3点：

第一是“出奇设伏”。“出奇”和“设伏”是诡道之术，可以一分为二，但也可视为一途，即使用奇法击退敌军。王余佑将其奉为决战谋略的不二之选。第二是“善于招降”。王余佑指出，“乘胜略地，莫过于招降”。因此可将“招降”作为决胜方略。第三是“必取要害”，攻击对方关键之所。孙子用兵，主张“夺其所爱”：“先夺其所爱，则听矣。”这里的“所爱”，往往也是要害之地。王余佑认为，如果攻占要害之地，则可以有效避免“屈力殚货”和“钝兵挫锐”的难局，理应成为战略决策的首选之地。

从决战的角度出发，王余佑强调应对速决战辩证看待。他指出，用兵固然贵速，但要想克制取胜也不能一味求速。他以“博虎”为例对此进行说明，如果发力过早或者用力过猛，必将为虎所伤；若徐徐图之，静等其疲惫，则可采用张设罗网和挖掘陷阱等方法捉住老虎。用兵的道理与此相仿，需要等待合适时机，做好前期准备：

“吾之用兵，自初起以至于势成，敌境日蹙而力亦日专，此亦负隅之虎

也。吾欲一举而毙之，岂可不厚为之防哉？”

由此可见，高明的战略家，并不是一味求速，更不会急于求成，而是懂得以退为进和一张一弛。也就是说，并非遇事都要力求“一举而毙之”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对待，该速则速，当缓则缓。

备战方略

对于备战方略，王余佑从防守、立国、屯田、蓄势等4个方面加以论述。

王余佑认为，要想做好防守，“必审形胜”，即懂得据险而守，懂得防守要领。他指出，要想立于不败之地，在立国之时就应有合理规划，而且有规模。在强调占据形胜和拥有地利之外，王余佑也就立国方略的其他内容，如经济措施、选人用人等问题进行了总结。在打破旧制、建立新规时，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，才能确保己方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

在各战和立国方略中，财政管理是重点内容。如何保证三军足食，始终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头等大事。王余佑就此提出“必资屯田”的方略。战争消耗巨大，需要保证有足够的后勤补给。在“掠无可掠”和“无法转输”的情况下，作者认为解决办法就是屯田。当然，屯田也需讲究方略，区别不同情况，比如要区分平时与战时、兵屯与民屯等。王余佑指出：

“屯田一着，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。其法不一，或兵屯，或民屯。大抵创业之屯与守成之屯不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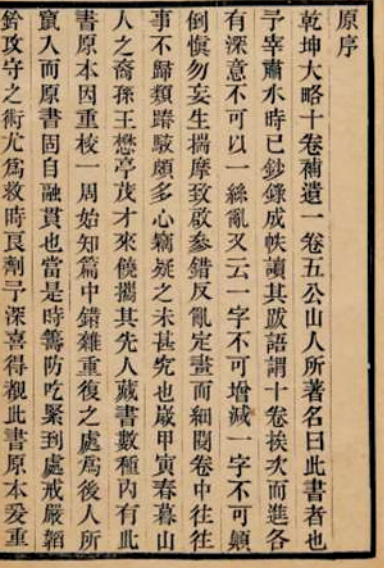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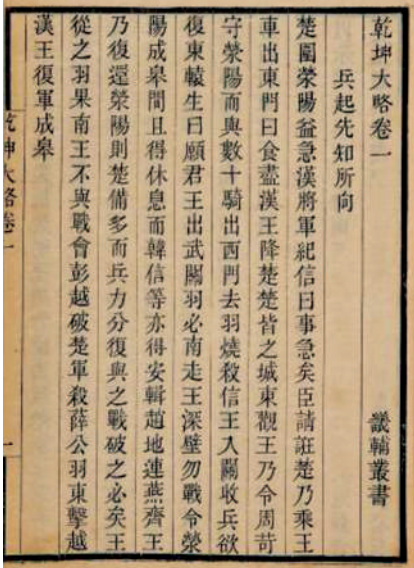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，他认为屯田是解决备战和立国问题的根本国策和长远之计。

就备战而言，王余佑格外重视“蓄势”，认为将师要想求得“全胜之术”，必须懂得“蓄势”和“蓄力”。他指出：

“故欲克敌者，强其势，厚其力，然后堂室降、正旗鼓，声罪致讨而施戈索，乃全胜之术也。不然，吾宁蓄全力以俟之。”

求得全胜之术是每个军事家追求的目标，但在实际中很难做到。既然如此，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求得全胜，就应保持头脑冷静，学会韬光养晦、蓄势待发。

王余佑所论战略学内容，既包括孙子所说的“修道保法”，又包括“上兵伐谋”“兵贵神速”和“以奇用兵”等内容。与孙子不同的是，在《乾坤大略》中，作者论述这些战略思想时，更多结合了历代经典战例，而且当长则长、当短则短，恰到好处地论证了己见。



王余佑著《乾坤大略》